

## 浅论《儒林外史》中的真儒士与真名士形象

庞海东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而《儒林外史》为大家所关注和熟知的多为吴敬梓所讽刺的假儒士和假名士, 如周进、范进等, 对文中的真儒士、真名士形象有所忽视。本文从作者吴敬梓坎坷的生平与儒道兼济的思想入手, 着重分析小说中的褒性人物形象自身意义以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从而更加全面地解构小说的内容, 分析小说的主旨和导向, 窥探出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意义。

**关键词:** 吴敬梓; 《儒林外史》; 真儒士; 真名士

但凡提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sup>1</sup>和《红楼梦》自是无法绕开的两部杰作。今人看来,其颇有南北鼎立,一时瑜亮之势,然而当时并非如此,所谓“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 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文木之《儒林外史》”<sup>2</sup>之言,显是后人追述之评。但无论如何,《儒林外史》确有其难以估量的文学价值。

《儒林外史》的主题历来存有争议,有其好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提出的“《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sup>3</sup>; 闲斋老人在卧闲草堂本的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装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sup>4</sup>赫然提出“功名富贵”说; 有胡适 1920 年《吴敬梓传》中提出的“反科举”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清之讽刺小说”一文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sup>5</sup>提出讽刺士林说; 以及后来研究者所提出反儒说、儒林痛史、文化反思说等等,不一而足,并无定论。然而一书之主旨,定与其作者之思想,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之刻画紧密相连。而且所谓相由心生,小说中的人物刻画与作者立场意图也必有一定关联。故分析其中人物,尤其是作者所肯定的积极的人物,对于解析作者思想、全文主旨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儒林外史》最后一章中的一张“幽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名士”,显现出作者对他们的认可,然作者最中意的人恐怕还是“隐括全文”的开篇人物王冕。王冕“重视文行出处”,是一个学习“古人的诗文”的儒士,他见多识广,博古通今,“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是一个具有深厚儒学功底的贤人; 并且又是一个看破功名富贵,突破名教限制,看重自然情性的风流之人,他雨后画荷、自制衣冠,载着母亲在湖边村镇到处玩耍,他保留了自然的本性,追寻淳朴和谐,具有理想的人格,是魏晋风流的余风。可以说,王冕兼具了儒士与名士的精神品格,是作者所塑造的,也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人格。那么根据“隐括全文”的王冕自身具备的儒道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可将书中褒性人物分为以庄尚志、虞育德、迟均、萧云仙为首的真儒士和以杜少卿为首的真名士。在这些正面人物的塑造中显现出作者所推崇的名士、自身的信仰与小说的主旨。

<sup>1</sup> 《儒林外史》版本纷杂,本文以通行本五十六回本为准。

<sup>2</sup> 易宗夔.《新世说》卷二《文学》[M].1918 年刊本

<sup>3</sup>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吴敬梓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01 第一版:128

<sup>4</sup> 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07 第一版:99

<sup>5</sup>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07 第一版:198

## 第一章 吴敬梓的思想与《儒林外史》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sup>6</sup>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这一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可。想要了解《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人物本质、以及其主题，必然要充分了解和认识其作者吴敬梓的思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的一生坎坷不平，似杜少卿般生于富贵，而死于寥落。祖辈地位显达，家族兴旺，所以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从小深受正统儒家教育的影响，诗书礼乐，自是十分推崇，这在《儒林外史》中真儒士的人物形象中反应十分明显的。然而正直不阿的父亲为人陷害，抑郁而死，对他是一个十分大的打击，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曾奉为圭臬的儒家思想，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亦不能救世。他深为迷惑。此时家族对他的迫害，蓄意侵他财产，更是让他心灰意冷。于是他以叛逆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挥金如土，崇尚自然，旷达随性。这自是正统道家、魏晋名士的思想。而表现在小说中的杜少卿，就更为明显。杜少卿，被大家认为是作者吴敬梓的自我写照。他的叛逆思想和所作所为，想必是吴敬梓经历或者是其向往的一个状态。

《儒林外史》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正是吴敬梓的反叛与探索成就了它。而其中的褒性人物，更是体现了吴敬梓的思想的矛盾与对社会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的探索过程。兼具仁义礼乐的儒心与自然超逸的道心的吴敬梓，塑造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真儒士与真名士。

吴敬梓生于官宦世家，其曾祖、祖父两代中有六名进士，一名榜眼，一名探花，可谓盛极一时。虽然到其父辈一代已渐衰微，但祖上良好的仕宦传统，优厚的家庭条件，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也使吴敬梓受到了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来，如虽已失传，但有残篇的《诗说》。《诗说》是说解儒家经典《诗经》的作品，其中表现了吴敬梓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吴敬梓深受颜李学派影响，“颜李学派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sup>7</sup>他们主张经世致用，反对一切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可谓是先秦儒家之正宗，以礼乐兵农来治国安邦。儒学，从先秦至明清，代而有变，宋之理学，明之心学，再至有清一朝，儒学已沦落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早已不是实现抱负，定邦安国的经世之学。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吴敬梓身处其中，必然有深刻的了解。他追随颜李，反对科举，在《儒林外史》中更是揭露了这样一批儒士，他们戴着儒家的帽子，而失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寡廉鲜耻、忘义贪利，一心追逐功名富贵。

他向往和推崇的是真儒学，是不计功名富贵，不沉溺于空想的儒学。吴敬梓的儒心，是一颗德行为先、仁孝并举之心，如虞育德般圣贤斯文；吴敬梓的儒心，是一颗讲究“文行出处”、知礼守节之心，如庄尚志般谦恭博学；吴敬梓的儒心，是一颗制礼作乐、果践果行之心，如迟衡山般经世善学；吴敬梓的儒心，是一颗济世安民、礼乐兵农之心，如萧浩父子般忠孝为先。

“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迷信活动，吴敬梓自然是颇有微词，或是嘲讽的，但笃信儒家思想的吴敬梓是如何对待释道的呢！除却迷信活动之外的佛家，讲究姻缘，讲究修行，讲究善果。并且在中国强大的文化包容力之下，儒释合流，自是不可避免。并且儒家的爱民，仁孝等观念，同时也是释家所尊奉的法则。

《儒林外史》中的和尚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是势利小人，他们和那些“假儒士”一样，早已忘却教规，陷入尘世，勾结乡绅，追求功名富贵。如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中举前的周进与王举人的所作所为，势利无耻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巴结官员，殷勤献媚，争财夺产，一点不像是六根清净的佛门弟子。但这是吴敬梓对当时功利社会现状的批判，是对追名逐利的“假和尚”的讽刺与鄙视。虽然小说中揭露和讽刺了大多数和尚，但是并不能由此说明吴敬梓对佛教的贬斥态度。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确实青睐有加，他“清癯面貌，颜色慈悲”，“两个梨”传了二百多僧众，待人厚道，并且讲究信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是典型的儒释合流的体现，他所奉行的精神，有儒家的仁义、忠孝等思想。所以作

<sup>6</sup> 孟子著，《孟子·万章下》 [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一版:193

<sup>7</sup> 陈美林著.《吴敬梓研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08 第一版: 2

者对其格外偏爱，这也足以说明，作者眼中并没有严格的宗教界限，只要是人间“真善美”，都是他所推崇和鼓励的。吴敬梓曾多次到寺庙之中，这可以从他《文木山房文集》中的诗文中得知：如《琉璃塔》、《灵谷寺》、《永庆寺》、《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赠真州僧宏明》等。<sup>8</sup>这些作品，虽然并未直接咏赞寺庙，但细想来，若是厌恶贬斥，怎会如此经常往来于其中。由此可知，吴敬梓对和尚的批评讽刺，也是基于功名富贵标准的，这和批判士林中追求功名富贵的假儒士假名士的观点是一致的。

而对于道教，在文中他用了相似的方法来讽刺。道士们趋炎附势，勾结地主，争利逐财，是混入尘世的伪道士。吴敬梓对这种伪道学是十分厌恶的，并在小说中加以鞭笞。然道家思想，自老庄而来，后经更迭，而为数支，道教是一支；魏晋名士的旷达，追求自然，不慕名利，亦是其余脉。他鄙视道教之异端，更是对爱慕钱财的伪道士痛加讽刺。但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吴敬梓，身处名教束缚之中，却十分推崇魏晋风流。所以并不能简单的说他是贬斥道教的。

“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sup>9</sup>这是其好友程晋芳对他的评价，我们对照他自己的诗文，可知此评价十分中肯。吴敬梓对魏晋六朝人物十分恭敬，并且有意于学习阮籍、嵇康他们的蔑视礼教，不拘习俗，赋诗作文，快意人生。这是一种对正统思想的叛逆，是吴敬梓遭受过人间凄苦后的改变，也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由此可以说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对吴敬梓的影响非常大，在小说中他大胆着笔，赞扬不附权势的隐士，揭露庸俗污浊的社会。正是这种思想，才使他敢于批评，也正是这种思想，才成就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他的这种经历，在作品中的最好体现便是杜少卿，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就是吴敬梓对自身的理想期待。虽然他已经足够叛逆，但在当时社会中，周围的礼教压力，让他的反抗并未像杜少卿般彻底。

总之，吴敬梓的思想相当的复杂，并不能斩钉截铁的一概而论，儒释道思想的合流，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深信儒家之礼制仁义，融合儒释，但受到打击又不得不另找寄托，这是顺理成章，亦是中国人千古不变思想历程。

<sup>8</sup>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吴敬梓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01 第一版

<sup>9</sup> 清程晋芳.《寄怀严冬有》,《勉行堂诗集》卷五

## 第二章 制礼作乐真儒士

儒士是指崇信儒家学说的士人。他们以儒家经典为楷模，重视人伦道德；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讲究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来是他们的人生信念，他们追求成仁、成圣，而不以功名富贵为重。

然而，传统的儒家，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既有修齐治平的精华，又有迂腐不堪的糟粕。那些奉行儒家学说的“庸人”，如为儒家马首是瞻的马静、八股才女的鲁小姐、谨遵儒家封建礼教鼓励女儿殉夫的王玉辉等，也是属于真正信奉儒家学说的士人，只不过他们顽固不化，不分糟粕，尽数吸取。真假儒士的划分，不能简单的以是否熟悉遵循儒家学说为标准，而是要更细致的划分。在这里，我们设定一个儒家真精神的概念，来作为区分真假儒士的标准。根据《儒林外史》中作者所赞赏的儒士，可知小说中的儒家真精神，就是德行仁孝、知礼守节、治世安民而又不迂腐顺承、盲目崇儒的精神，那些以儒学为手段而谋取功名利禄的人自然是假儒士，而马二、王玉辉等人的思想，也可以归为假儒士的行列。所以，小说中的真正的符合儒家真精神的真儒士就是虞育德、庄尚志、迟均以及萧云仙等人，这也是作者在后半部小说中所着意刻画的人物。

吴敬梓在表达对真儒士和真名士崇敬的同时，还能一分为二，剖析某个人的优劣两面，既看到他的落后迂腐，又能看到他的人生闪光点。其中马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作者爱其率真淳厚的本性，又讽其醉心科举、迂腐地执着，作者看到他性格的两面性，冷静描写，精细描绘，展现出作者对人性本真、自由的追求和对封建制度落后性的辛辣讽刺。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纷杂层叠，儒、道、佛、乡间农人比比皆是，但作者的用意还是多在士人，作者以辩证的眼光分析人物，以功名富贵为骨，将人物一分为二，褒性人物与贬性人物；再据主要人物细而分之，根据儒家真精神将儒士分为真儒士与假儒士，名士可分为真名士与假名士。而小说中的褒性人物是作者理想的寄托，故此文主要介绍小说中的真儒士与真名士，以明确主旨。

真儒士	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等
假儒士	周进、范进、王蘊、王德、马静等
真名士	杜少卿
假名士	杨执中、权勿用、遽公孙、牛布衣、匡超人、支剑峰、景兰江、娄三、娄四、赵雪斋、杜慎卿、季苇萧等
奇人	王冕、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

假儒士，是《儒林外史》中前二十八回的描写重点，也是历来人们研究儒林人物所重视的重点。真儒士，与之相对，虽然书中的描写笔墨稍弱，但我们更应该重点看待，着重分析，以正确剖析作者的人生信仰与小说主旨。

小说中的真儒士有仁德之士虞育德，忠节之士庄绍光，礼乐之士迟衡山，以及践行儒家理想礼乐兵农的萧浩萧云仙。下面做一一介绍。

虞育德，字果行，据金和跋：“其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按指虞育德）。”<sup>10</sup>虞育德是国子监博士，而他最重要的活动则是泰伯祠的主祭。大祭泰伯祠是作者正面描写歌颂正统儒家“礼乐兵农”的活动，主祭自是真儒不可。且小说最后一回的“幽榜”中也将他列在第一名进士，可知他是书中的一个“纯正无疵”的“真儒”，是作者赞扬的第一流的真儒士。小说中更是以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一回“特为立传”。

育德果行，当以仁德为先，忠厚浑雅，道合中庸。虞博士出身于一个极平常的田间乡农之家，一生又是极其平常，他以教书为业，从私塾馆师到成为国子监博士，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的“真儒”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他极重视内心修养。儒家讲“内圣外王”，修身才能齐家治国，把德行修养看作是为人之根本。虞博士一生虽平淡无奇，但其真诚无私、宽仁爱人、施恩不图报的品性，自

<sup>10</sup> 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200)



是儒家这个方面的代表。如小说中第三十六回所提到的朝廷选做翰林，那些进士在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唯有他写的实庚：五十岁。于是只是得了闲官，而他反倒欢喜；尤资深给他出主意，要求康大人推荐他，并要他先推荐了去，再推辞，虞博士甚为不耻，“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虽如此，也并未责备尤资深；施恩处处，不图后报，他把用来补贴断炊的银两，毫无迟疑的送给并不相识的受困人；他不仅给郭孝子写信推荐，并且自愿出银，还把这等善事推到杜少卿身上，真真的是大仁大义之举。这种种事情，虽是平淡，却塑造出一位具有深厚内心修养的宽厚长者的形象。

其次，他注重德行教化，礼让忠恕。虞博士处事上，十分的宽仁忍让，贯彻着儒家的仁德思想。例如小说中，虞博士的侄子借他的房屋住，后来竟然擅自做主，拆了卖掉，并且再来索要银子租赁屋子住，这是何等恼怒之事。而虞博士不仅不加责备，反而又给了他三四十两银子去典几间房屋住。面对如此无赖行为，但凡修养差点的必然大发雷霆，而虞博士本着忠恕之心，施行德化行为。还有后面他做监考官，学生作弊，他不但不揭发，反而替他遮掩，更奇的是事后并不放在心上，装作并无此事。事前有些迂腐，事后方知此乃虞博士以德化人的品质。他胸襟宽广，无论何事，均能容纳，且内心坚定，终不忘化人育人。

再次，他不重功名富贵，乐天知命。如何对待功名富贵是小说中判断一个人真假优劣的一个标尺。虞博士看淡仕途，不汲汲于名利。杜少卿说：“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超然世外，平淡中和，追求人格独立，生活平淡安逸。更难能可贵的是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一生，求学、教书、娶亲、应试，无一不是顺其自然。即使是生活困顿，断炊少粮，亦不见他着急。

总之，虞育德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名真儒，一名“上上人物”。无论是“特为作传”的正面直接描写，还是背面敷粉烘云托月的间接描写，都意在突出他为人的忠厚，都在赞扬儒家的仁德。“就此而言，誉之为第一人也并不为过。”<sup>11</sup>

另一位便是恬逸有道、忠礼守节的庄绍光。庄尚志，字绍光。吴敬梓描写出了一位与虞育德性格追求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儒士。如果说虞博士的侧重点在儒家传统的宽仁德养的为人处世之道，那么写庄绍光则是写他所表现的儒家的入世思想与政治原则。

庄尚志是祭祀泰伯祠的“亚献”，是“幽榜”中排名第二的进士。他博学多才，谦恭待人，名满天下，却终生不过是一名生员，这是当政者的无道昏庸，官场的黑暗倾轧，更是庄绍光作为一名儒生自己的选择。作为儒生，他深研《礼》、《易》等儒家经典，但他又非迂腐不通，反而深谙世事。就像虞博士乐天知命一样，他坚定地守着自己的政治原则，于功名富贵不屑一顾。而这样的政治操守正是对正统儒家传统理念的继承。

他是一位知礼守节的儒士，他重视君臣之礼，恪守国家禁令，不敢有丝毫违抗。小说中第三十四回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定回来。”这里展现了一个儒士应有的风度，他不为官，君臣，父子人伦之大道，却是万万不敢违抗的。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不敢有任何逾越封建秩序的叛逆行为，这点上和杜少卿是大大不同的。他不仅奉行君令，重视君臣之礼，并且是“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还劝朋友卢德勿读禁书，遵行国家禁令。他尊崇的是君仁民安的治国方案，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所以对山东道士赵大劫饷事件看做是民不安其分，作乱犯上。另外，祭泰伯祠的礼仪校订，多是出自他手，连“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可见他的学识之渊博。

他是一位坚守自己政治原则的儒士。虽然儒家讲求积极致仕，治国平天下，然而，儒家又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sup>12</sup>。儒家之道是仁义，君主圣明，行仁义之道，儒士方致仕辅佐。“讲究出处之道成为正统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成为真儒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操守。”<sup>13</sup>他们的入世是有原则的，天子招贤，作为儒士，他是必须应招的。但是朝廷腐败，官吏黑暗，即君主不行仁义，不行大道。他对朝廷十分的失望，便只能行“独善”之路。他应招之时，便已坚定此心他对妻子说“我定回来”，正是此意。这是他的政治坚守，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执着。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两面性，是儒家趋向道家的一个方面，但他们的目的又是不同的。

<sup>11</sup> 陈美林著，《儒林外史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五月第一版:169

<sup>12</sup> 孔子,《论语·泰伯》

<sup>13</sup> 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九月第一版:84

庄绍光有着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并始终奉行，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作者对他的赞扬，也表现了作者对此观点的赞同，对统治者不识贤能，任用奸佞的讽刺。他坚持自己的儒学操守，恪守礼仪，遵行禁令，毫无叛逆反抗精神，但却十分赞赏杜少卿的行为，这也体现了他思想的包容性和儒道合流的倾向。

“制礼作乐”迟衡山，他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小说中穿针引线勾连上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迟均，字衡山。他是一名生员，季苇萧说：“迟先生有制礼作乐之才，是南邦名宿。”他提出吴敬梓最为信奉的“礼乐兵农”思想，他引杜少卿首次见到庄绍光，他引出了本书第一真儒虞育德，他是大祭泰伯祠的倡导者、实施者，全书所赞扬的真儒士、真名士的出现几乎都与有关，可知他本身“亦不是庸流”。

小说中的迟衡山并没有虞育德的完美形象，亦没有庄绍光的礼乐之才，但他的长处在躬身实践，经世致用。这是儒家仁义、礼乐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精神。儒家讲事与时移，“穷则变，变则通”，学习之道在经世致用。迟衡山的人物形象就恰好表现了儒家思想的这个方面。但他的思想也体现了儒家礼制思想的局限性，如他看重等级，轻视戏子，看不起女性。

迟衡山在小说中的出现是较早的，他参与了杜慎卿的“莫愁湖高会”，后才结识名士杜少卿。他并不赞同莫愁湖之举，这是不符合他心中的礼制的，是有失文雅的。大祭泰伯祠是他提出并践行的一次堪与“莫愁湖高会”等同的大活动。这两次活动也体现了作者吴敬梓的态度，两相比较，对前者的讽刺贬低，衬托出后者的重要与必要。迟衡山看不起这些做几句诗词就当做极雅的事的假儒们，他要借祭祀泰伯祠来复兴古礼古乐，让大家见识学习一下真正的“雅事”，“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可以说这是作者勾勒的振兴儒道的一项重大盛典，它的意义是重修古礼古乐。

迟衡山是大祭泰伯祠的“引赞”，是这次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他联系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使得整个活动井然有序，一丝不乱，这是他制礼作乐的才能。但他的“制礼作乐”之才与庄绍光又是不同。庄绍光精研《礼》，做的是学问，而迟衡山却是实践者。小说中写道他把自己写的底稿交给庄绍光斟酌，据此可推知他定是十分熟知礼乐。而接下来经他一手安排的礼乐之器以及祭祀流程，也更可以体现出他对礼乐之熟悉和躬行之谨慎。

他的性格发展也是作为一名真儒士的必要条件。虽然他有时过于迂腐封建，但他善于学习，特别是跟随杜少卿等一批名士之后。他对功名与学问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这是极有道理的，可见他既有志于学问，对功名富贵自是不放在眼中。这也是他对那些以学问为掩饰而追求功名富贵的假儒士的质问和不满。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的勇者思想，也是最后迟衡山的形象，是他人格的升华。当大祭泰伯祠烟消云散，助政教的作用并没有达到，迟衡山回到故乡继续他的理想，培育人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就是迟衡山的精神。

书中另一个儒家思想的践行者是萧云仙，他不是一位儒士，却是书中褒性人物中的其中一位，并且他施行的是儒家礼乐兵农的政策。松潘卫青枫城是吴敬梓塑造的一个理想世界，他远离尘世，是作者心中的桃花源。

青枫城是萧云仙攻下的边城，远离政治，远离现实世界的黑暗，是一个理想的施政地方。萧云仙在此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开沟修渠，劝课农桑，兴文教，办学堂，这都是礼乐兵农思想的践行。吴敬梓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忠孝之士，目的是在歌颂儒家礼乐兵农的治国思想。并且萧云仙这样一个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小说中的真儒士是有紧密联系的，庄绍光受召时曾路中与其父相遇，经过晤谈，自然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经武书穿针引线，他与小说中的真儒士得以相见。此时，泰伯祠已破败，萧云仙也是“因忠获咎”<sup>14</sup>。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等对萧云仙青枫城的事迹是十分赞誉的，但二者都已经归于幻灭。所以他们心中也不免伤感无奈，他们知道在封建礼教统治的大环境下，礼乐兵农的思想和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此次真儒的相聚，代表着礼乐兵农的终结，代表着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众贤人散了，萧云仙也退场了，贤人的理想破灭了，作者的理想也就破灭了，似有一种白茫茫大地的渺茫感。

小说的真儒士，着重的主要有这四个：虞育德、庄尚志、迟衡山、萧云仙。他们的形象并不重复，而是各有特点，各有侧重。虞育德仁德为重；庄尚志忠孝守节；迟衡山践行敢为；

<sup>14</sup> 陈美林著，《儒林外史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五月第一版:186

萧云仙礼乐兵农。他们是儒家思想的各个不同的方面，每个人都着重代表了儒家真精神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些人物也足见作者的儒家信仰，这也符合作者的人生经历，他自小的儒家思想的熏陶，颜李思想的影响。

由此也可见，功名富贵是全文的核心论题，是检验一个儒士真假的试金石。真儒士都是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的，在他们眼中儒家的仁礼乐政才是立身之道。迂腐不堪、盲目信儒的假儒士也是作者着力批评的一群人，他们对社会的黑暗起到了一定的助力。追求功名富贵的社会，定是失去信仰、无可救药的社会，儒道不行，社会黑暗，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对清明世界的向往与追求。



## 第三章 率性自然真名士

名士与儒士不同，他们不以儒学为尊，不以致仕为目的，却重视自然、自由，是德行真纯、道术通明的人。名士所遵循的思想即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这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他们么所追寻的是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生活的自然而不受名教的束缚，所以他们多隐逸不仕。而儒家讲求致仕，一展抱负，这与释道截然相异。儒家虽讲“天下无道则隐”，自是无奈之举。而假儒追求功名富贵，早已忘却人伦道德、忘却先贤修齐之教导。

然古有“乡举里选”的选拔方法，注重人的德行名声，名士自然受到征召，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自然把这个看做“终南捷径”，好名之风大盛，盗窃虚名的假名士便层出不穷。

名士和儒士的区别在于对待仕途的态度。并且儒士奉行儒家修身养德之道；名士重修养、德行名声，但他们有更多的自我意识以及反抗精神，他们反对名教，挣脱礼教，崇尚自然。

杜仪，字少卿，金和跋：“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sup>15</sup>这个观点也被历来的研究者所接受，并有学者撰文考证他们的联系，书中杜少卿的一些事件能在吴敬梓的生平事迹中找到对应。但他们又不完全相同，杜少卿的形象是其塑造的理想形象，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程度上比现实中的吴敬梓更为彻底。

杜少卿出身于诗礼世家，家道殷实，“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所以他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他却有着豪杰的性格，慷慨大义，乐善好施，广结朋友。他不看重功名富贵，也不专注于科举仕途，这是他对儒家名教的反抗，也注定了他的矛盾人生。祖上是科举世家，而他“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他不求功名，厌弃仕宦；出身于儒学，却又奉尊道家名士风度，他清楚自身的矛盾，但在封建末世并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这也导致了他终生的迷茫。

吴敬梓对六代名士情有独钟，他向往魏晋名士潇洒自然、飘逸超脱的生活，这可在他的诗词中有所窥探。如《移家赋》中“阮籍之苦途穷，肆彼猖狂”，《买陂塘》中“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联句中“佯狂忆步兵”等诗句，都表现出他对六朝名士的崇敬向往之情，而这也是小说中杜少卿的一种性格。

杜少卿鄙弃功名富贵，不去应举，不去奉召，散尽了家产，但他并不以为意，移家秦淮河，生活无拘无束，这是他崇尚自然的心性，是他超脱世俗物质的风度，当真做到了“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小说中李巡抚有意荐举于他，而他以“麋鹿之性”加以推脱，这是他的率性自然，也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与那些假名士沽名钓誉的行径绝不相同。他坚守的是他要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的生活。

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区分儒道的的一个标准，儒家并不否定功名富贵，可以说是有意于功名富贵，但他们以“道”为准则，这种“道”是以仁义为核心，并不是以功名富贵为目的；道家则是完全的摒弃功名富贵，他们放任身心，以自然随性为尊，不以世间俗事所扰，他们追求的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杜少卿就是这样一位道家名士，财富、权势、名声，仿佛与他无关，他那旷达超脱、遗世独立的精神与这浑浊的世界背道而驰。

杜少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他却敢于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他的放任自由、超逸恣意的精神让他迥异于儒士。小说中的少卿说《诗》，是一个重要的细节。《诗经》是儒家的经典书目，历代都有儒士说解，而杜少卿并不是一位儒士，也可以说是一位偏向于自我意识自觉、向往道家飘逸超脱的儒士，他的说解，自是和传统不同。他的《诗说》大胆的对朱熹，提倡个性解放，宣传自己怡然自乐、鄙弃功名富贵的思想，如他对《女曰鸡鸣》“夫妻和谐，不慕名利”的解释就显示了他超脱飘逸的人生追求。他对《诗经》的独特见解，展现了道家对《诗经》的解读，显示了他的反抗礼教的精神。

杜少卿有着进步的女性观，他并没有奉行传统儒家轻视女性的观点，而是十分尊重女性，并且肯定人们之间的感情。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携妻游览姚园：“竟携着妻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种有伤风雅、违背礼教的事情，令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但这也正是他性格中的真我率性使然。这件事“作者以反笔为颂的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既颂扬了奇人，又讽刺了庸众”<sup>16</sup>。另一件是沈琼枝逃避盐商的事，当大家都不以为意的时候，他却有着公平的判断，

<sup>15</sup> 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七月第一版:129

<sup>16</sup> 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九月第一版:106

不轻视，知道实情后，更是赞扬。他认为沈琼枝是“可敬”极了，并且出谋献策，大施援手。这也表现了杜少卿的与众不同的女性观，以及他的超脱礼教的名士精神。

杜少卿是一个奇人，他狂傲不羁，蔑视礼教，继承了魏晋风流。他鄙弃世俗、厌恶功名富贵，坚守内心的超逸飘洒。他是沽名钓誉的假儒士横行时代的真名士，是儒家礼教统治下的“异端”，是这个时代的自我觉醒的代表。

杜少卿代表的是封建末世的觉醒者形象。他反抗儒家传统礼教的束缚，倡导女性解放，个性自由；他反对害人至深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讲究文由心生，重视传统继承；他蔑视功名富贵，追求自我的人格独立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绝对统治下，他不可能延续自己的反抗，更不能找到出路，他终究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他精神的苦闷和迷茫，也决定了他黯然退场的必然。

杜少卿矛盾的复杂性格决定他的一生必然是充满迷茫的。他有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不能坚持反抗。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不能推翻传统制度，亦不能以释道来作为最终归宿。他厌弃仕途科举，又没有自己明确的理想。在他父亲死后，他广结朋友，散尽家财，这是他的本性使然，也多少有点赌气之举。他特立独行的举动被人们当做反面教材，但此时的他并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儒家的传统思想时刻影响约束着他，使他不能跳出这个苑囿。移家秦淮河后，这一束缚有所减弱，他的自我觉醒意识有所增强，但也只能寄托于大祭泰伯祠的活动来反抗封建末世的科举八股，他的反抗始终是迂回的侧面的，他并不能找到来解决这种弊端的有效方法，这是他复杂性格下的必然，也是封建时代下的悲剧。

这里可以和另一部伟大的作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比较。二书时代相当，都处于封建衰败的末世。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和反抗者，并且书中主要人物还都是作者的“自写其照”。但贾宝玉的叛逆与反抗远远超过了杜少卿。暂且不提《儒林外史》未提到的婚姻自由观，在反抗封建正统思想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上，贾宝玉也更为深刻。杜少卿的反抗是十分不彻底的，他“重读”《诗经》，反抗的是程朱理学，而不是反对儒学。他追求是返古，推崇的是正统的古代礼乐。他反对的是宋儒的儒学，并不反对宋儒之上的儒学，这是和贾宝玉十分不同的。贾宝玉的反抗较为彻底，他深谙经典，但不信经典，还自己“杜撰”经典，他怀疑礼教，怀疑儒学，对儒家的反抗更为深刻。杜少卿尊礼崇孝，贾宝玉则不重礼制寻求更为自由的自我。

小说的最后，贾宝玉归于释家，是迥异于儒家的虚幻，是看透了世事苍凉，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他的一生终归于坚定的舍弃。而杜少卿的终场，虽然也是无法在士林中生存下去，不过去找虞育德招讨，他没有对封建制度彻底的失望，他带着迷茫淡出了舞台。这是曹雪芹和吴敬梓对那个时代的不同看法和表达，展现了他们心目中人物的归宿。

总之，杜少卿的名士形象并不仅仅与六朝名士相似，他还有深厚的儒家底蕴，这也决定了他复杂的性格，精神追求的迷茫。所以在相同的时代，同是叛逆，他却保留着一种对儒家礼乐兵农盛世的幻想；超脱世俗，鄙弃功名，人格独立却又是他不同于儒士的名士风流，他的一生混杂着儒道思想，这也决定了他复杂的性格。

从杜少卿的复杂性格上，可以体现出吴敬梓的精神信仰，也可得知《儒林外史》一书并非以反对儒家为目的。它是以功名富贵为主线，在儒家救世而不可得的困境下，寻求道家的解脱。它是未认识到封建儒家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这也决定了他终究不能走上彻底反抗封建制度的道路。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成为后代文学批评的经典理论，作者和小说密不可分，而小说中的主要内容有可能是作者生活的写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有可能就是作者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作者着意刻画的《儒林外史》中的真儒士和真名士形象，也正是作者自身的生活剪影，寄寓着作者欲为而不能为的人生无奈。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核心线索，批判了假儒士、假名士，赞扬了真儒士、真名士。人生不以功名富贵为目的，而是追求自身理想，人格独立，这是作者心中的向往。它描绘了一批真儒士在儒家仁义礼乐下的精神信仰，一批真名士在道家超脱潇洒下的人生态度。同时也揭露了迷恋功名富贵的人被重用，有志于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被排斥于社会精英之外无所作为的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控诉，预示了封建统治走向灭亡的必然。

一部《儒林外史》揭示了功名富贵下的众生万象，揭示了儒道相济的潮流趋势，深刻探

讨了知识分子生存的凄惨状况以及渺渺无边的前途。一部《儒林外史》是作者对不合理的封建末世的控诉，是作者自身信仰的宣言。

## 参考文献:

- [1] (清) 吴敬梓著, 李汉秋辑校. 《儒林外史会评会校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2] (清) 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 [3] (清) 吴敬梓著, 李汉秋辑校. 《吴敬梓诗文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4] 陈美林著. 《吴敬梓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5] 何泽翰著.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6] 李汉秋著. 《〈儒林外史〉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7] 李汉秋编.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8] 陈美林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9] 金开诚主编.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M].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 [10] 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4》[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鲁迅著.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 [12] 黄霖主编.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 [13] 季羨林名誉主编, 吕薇芬, 张燕瑾主编.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 [14] 陈文新, 鲁小俊, 王同舟著.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 [15] 郭因. 《知识分子的痛史——评〈儒林外史〉》[J]. 读书, 1982年第3期.
- [16] 朱靖. 《〈儒林外史〉中魏晋遗风管窥》[J]. 读书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年12月, 第十四卷第四期.
- [17] 秦川. 《〈儒林外史〉中的名士》[J]. 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2期.
- [18] 李汉秋. 《〈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J]. 文学遗产, 1998年第1期.
- [19] 沈治钧. 《〈儒林外史〉: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J]. 中国学术期刊.
- [20] 杨柳婵. 《浅析〈儒林外史〉中的真假名士》[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2年第6期.



## The image of real Confucians and celebrities in *The Scholars*

Pang Haido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scholars" is a very realistic satire novel,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But "the scholars" is well known for those fals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celebrities such as Zhou Jin, Fan Jin, who are satirized by Wu Jingzi. So the real Confucians and celebrities are neglected.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bumpy life of the author Wu Jingzi and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 and Taoism, the paper emphatically analyze the good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novel, which fully deconstructs the content, analyze the purpose and orientation of this novel and peep out the true meaning the author want to express.

**Key words:** Wu Jingzi; *The scholars*; True Confucian; Real scholar